

漫话南极之旅 (尾声)

李浩敏

李华梅离站回国 从 Melville 回来的那天下午 ,天气开始变坏 ,有雾 ,这可真帮了李华梅的大忙。她因与德国同行有合作研究的计划 ,原打算乘那天下午乌拉圭的一架货机到智利的彭塔 ,经圣地亚哥回国后再转赴德国。天气变坏 ,飞机走不了 ,只能第二天走了。于是我们两人又是洗澡又是洗衣服 ,还要向站长汇报在 Melville 的工作。我除了帮她把洗好的衣服烘干外 ,别的都帮不上忙。她要亲自整理标本、装箱 ,收拾行李 ,一直忙到夜里三点钟才睡 ,这是她的一个非常长的工作日。就这样 ,第二天走得仍然很匆忙 ,飞机都发动了 ,她才赶到机场。真险 ,再晚一点 ,就要等下一周才能走。难怪我们考察队所遵循的“南极精神”中就包括了“拼搏”。在南极的工作中 ,常常需要拼一下 ,才能过关。

访问韩国世宗王站 二月十八日晚得知 ,次日

韩国世宗王站要借我们的驳船 ,去智利机场拉运来的通讯器材。我们的站长和翻译小郎想起 ,一些队员(包括老李、老袁、陆华和我)曾有去韩国站的打算 ,于是向他们提出了请求 ,在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后 ,站长通知我们做好去的准备。我想去韩国站是因为元月八日晚上我从野外回来时 ,见到韩国站的全希永博士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 ,他也是研究古植物的 ,想见见我 ,但不巧没见到 ,他还说 ,马上要去智利站的机场 ,准备回韩国。我急忙找西班牙语翻译郎英杰 ,请他打电话给智利站 ,讯问飞机是否已起飞。幸好飞机还没走 ,我立即赶往智利机场。到那里时 ,全博士正准备登机 ,我忙上前 ,自我介绍 ,与他匆匆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分别了。这次会面使我得知 韩国站附近也有一个植物化石点 ,具体情况 ,他让我与他们的金站长联系。我当即感谢他给了我这个信息。



南韩站大门

第二天八位韩国队员去智利站取货，本来说上午 11 时到我站，后来又打电话说要晚一点儿，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到。听他们说还没吃午饭，负责接待的郎英杰让我赶快给他们准备一顿快餐。我煮了一大锅方便面，还把中午没打完的菜热了，满满地浇在每碗面上，另又各加上一个虎皮蛋。他们都说好吃，有一位甚至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面。这主要是冯师傅菜做得好，是中国菜的魅力；另外是他们忙了大半天，太饿了的缘故。

等他们吃过饭以后，两国考察队员一行十余人就一起出发了。我们到韩国站工作的有四位，有三位是研究地学的，一位是研究生物学的；此外，大宋师傅开船，另有两位研究生物的队员到对岸取水样，当天随船返回。在船上我和韩国站的医生聊得很投机。他叫金钻，才从医科大学毕业（学了六年），毕业后本应去服兵役（40 个月），他来南极当队医，并在这里越冬，就权当服兵役了。小伙子家是世医，到他这一代，已是第五代医生了。他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还能背几首宋词。他告诉我，以前他们没有文字，用的是汉字，到世宗王（King Se Jong）时，才创造了现有的文字，所以他认为，世宗王是他们

最伟大的国王。我想，这恐怕也是他们以“世宗王”来命名韩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原因吧。他还问我，中国的哪个皇帝最好，我想了好久也无法作答，只好所答非所问地说，中国的政治家（我偷换了概念）中我最佩服的是孙中山先生，因为他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末代皇帝，从此结束了存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他没

有罕见的勇气及远见卓识，这是做不到的。他说他很喜欢《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尊龙（John Long）演得很好。就这样，一见如故，一路行来，一点也不寂寞。

第二天清晨走出客房，见金站长正在升旗，除了韩国国旗、他们的队旗以外，竟然还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南极的考察站，一般只有来了外国的领导人或他国考察站的站长时，才会升起那个国家的国旗。因为我们几位普通考察队员的到来，升起了五星红旗，是给我们的最大礼遇。在韩国站的四天中（包括来和回的两天），只有一个半完整的工作日。我的第一个工作日因金站长给我的地点有误，没有找到化石点。那天晚上，他又在地图上给我标出另一地点。第二天，我很容易地找到含化石的露头。那里的地层及植物化石与化石山的完全不同，岩石是酱紫色的砂岩，所含化石都是植物叶的印痕，叶子较小，保存得不太好，种类也很单调。从采到的化石看，和化石山的地层相比较其时代要晚一些，很可能是始新世晚期，甚至是渐新世。因采集到的化石标本很少，难以做出准确结论。我认为，将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采集和研究，以便了解南极地区植被发展及气候变化的历史。

我们原定第二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钟回到站上，四点钟他们用橡皮艇送我们回去。下午两点半我开始从化石点往回走，路上有一个企鹅集聚的山坡，企鹅密密麻麻的很多。因听说过，企鹅虽然平时从不伤人，但如若以为你要侵犯它们时，也会群起而攻之的，据说一位外国考察队员就因此吃过大亏，因此我不大敢强行通过，于是就决定往上爬坡，上面是一个连企鹅都不愿意待的陡坡，为了赶时间，只能这样绕过企鹅群，因为从下面绕行太远了。回到站里，已是三点五十分了，老李说，如果四点半

我再不回来，他们就要找我去了。他们还说：“今天走不成了，风大，乘橡皮艇不安全。”晚上金站长问我采到化石了没有，我说采到了，他问我采到了多少，我如实告之，十块。他说，对面阿根廷站附近也有类似的化石。

根据现代人的观点，韩国的饭菜对人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他们每餐必吃的泡菜，几乎没有脂肪，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有利于减肥。难怪我见过的韩国人中，几乎没有一位是超重的。可我们几个都觉得韩国饭菜油水太少，虽然肚子饱了，却总还想再吃点我们带来的饼干等食品。这可能就是两国饮食方面的差异了。

晚上我和韩国站长、金钻医生等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有时候英文词汇不够用了，就用汉语笔谈。我发现，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了如指掌，对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有的地方比我了解得还详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也使我感到汗颜。有云：读史使人明智。我觉得，在历史知识的深入普及方面，我们还真得向我们的近邻韩国学习。

在韩国，围棋很普及，可惜我不会，只会下



室外温度摄氏零度左右，我们穿着棉衣，他们中有的人却只穿一件衬衫。

五子棋（韩国人称其为‘五目’）。我和他们下了两盘五子棋，一赢一输皆大欢喜。我发现，他们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下棋也很认真，至少和我接触的几位都是如此，我很佩服他们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还有一件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他们很耐寒，穿得都比我们少。室外温度摄氏零度左右，我们穿着棉衣，他们中有的人却只穿一件衬衫，腰板挺直，特别神气。这可能是不同民族的传统习惯问题。我觉得这值得我们研究、思考，并且应向他们学习，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万里无云，是难得的好天。可金站长说不能走，因为浪尖上有白花儿，说明风大。下午两点半，风小了可以走了。我们照了一些合影后，就乘橡皮艇出发了。四位韩国队员一路送我们回长城站。到站后，刘书燕站长吩咐陆华和我赶快准备些点心款待他们。我们煮了两大盘饺子，开了凤尾鱼罐头和菠萝罐头，外加啤酒等。他们不断地说，中国人真是热情、好客。回去时，站上还送他们站六斤冻饺子，

一箱啤酒以及花茶等。他们兴高采烈地开船走了。可是我很担心，他们每人喝了两瓶啤酒后，能否安全回去。还好，后来从电话中得知，他们已安全返回。

大丰收 站上决定，本届夏考队员及上届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几位越冬队员，将于三月上旬回国。我们都开始了扫尾工作，并忙着盘点自己的收获。

从一月底开始，我从化石山采到的标本就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不断地采到一些高质量的化石。这主要是因为刚来时，南极恰逢冬去夏来，地层大多都还被积雪覆盖，到处冰冻，我只能在裸露的地层中寻找化石，化石质量不很理想。经过不断摸索，在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一层富含植物化石的地层。可是要想从中找到完整的化石，必须把它上面的不含化石的岩层剥掉，先开出一个工作平台来。这可是一件大工程。我每天都要抽出几个小时，像个石匠一样，用凿子和地质锤不断地、一层一层地掀掉上面的岩层，有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弱小的蚂蚁，在啃一块大骨头。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元月末，我终于把平台开好了，开始陆续从中采到一些又大又完整的植物化石标本。过去因标本破碎而产生的一些分类、命名方面的疑难问题，随着高质量化石的不断发现，将会得以迎刃而解。这是我到南极工作以来取得的最大收获。

在南极，我时刻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来自勉。年

近花甲的我，常能超水平发挥。譬如有一天，我采到好多绝顶的好标本，装了满满一大背包，背在肩上以后都站不起来，几起几落之后，才勉强站了起来，回到站上一称，背包重量——56斤。还有一次也是在化石山，在山顶开剖面时，一不小心，从上面突然滑落下来，只几秒钟，人就到了山脚。我站了起来，又返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现在想起这事来都有点后怕，如果我当时是骨质疏松的话，那非骨折不可。我常常想，这次南极考察之所以能勉强胜任，要归功于我从青年时开始积极锻炼身体。我国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时，我是个中学生，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于是我立志要当一名工程师，建设祖国。我当时想，为了实现自己的志愿，只有学习好还不行，还得积极锻炼身体。上高中时，清早上学，我都跑步去，不仅练了长跑，而且还用路上节省下来的时间，把学校操场上的“十八般武艺”（爬绳、爬云梯、走浪木、练双杠等）都练上一遍。这每天大约半小时的锻炼，以及上大学期间坚持长跑，使我终生身心受益，不仅身体比以前健康了，也培养了我性格上的



在圣地亚哥居住地合影，后排左三为刘书燕站长，左一为西班牙语翻译郎英杰，左五为杨锦。

坚韧。青年时期开始的锻炼身体的习惯助我在南极工作中通过了种种的“考验”。其中一次发生在“极地”船即将离开长城站，前往中山站之前，船队领导请我们站的全体队员到船上吃饭。我们乘驳船来到大船边，我一看，要想上到那个万吨巨轮的甲板上面，只能靠云梯。看着那几层楼高的、软软的云梯，心里有点发怵，不知自己还能否胜任。轮到我时，只好咬着牙往上爬。虽然后来两臂有点发抖，总算爬了上去，我感到很欣慰。

归国之路 三月八号我们开始踏上了归国之路。我们的路线是从智利站的机场乘大力神（一种货机）出发，到智利南端的小城——彭塔（Punta Arenas），然后换乘客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那里我们将停留十余天，算是调整，或是补休。这以后再乘机经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然后飞越太平洋，经东京时停留两天，略作休息后，飞回首都北京。这一串地名听起来够长的，需要多次换乘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对我说来，格外吃力。因我除了有一个大行李箱子外，还有九箱标本，

要一并带回。每换乘一次飞机，我都要亲自托运、领取，确保标本安全，以免前功尽弃。

圣地亚哥之休整 我们在南极的近三个月的工作中，基本上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我们甚至只记这天是几月几日，根本不管它是星期几。就这样，还觉得忙不过来。大家都沒有怨言，因为来一次南极不容易。我们的领导很人性化，考虑到大家很辛苦，特地让我们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多停留几天，休息一下。

智利共和国位于南美洲的西南部，西濒太平洋，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版图十分狭长，跨越了几个气候带。智利人口1200多万，其中有近一半，即500多万人居住在首都圣地亚哥，那里属地中海型气候，适宜居住。智利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我们在智利待了十来天，有两件事值得一记。首先说住的问题。国家南极办为了方便去长城站人员的来往以及其他一些事项的需要（如补充给养、购机票等），特在圣地亚哥购了一处房产，让一位有西班牙语专长的人员在那儿工作、管理。那是一座二层的小楼，没什么家具。我

们来的人中男同胞多，大多住在二楼打地铺，二位女士住在楼下。这种方法节省了大量的住宿费，而且我们自己开伙，每天三个人一组，轮流值班做饭，也节省了伙食费。我觉得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值得提倡。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当时我国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先生正好



钱其琛先生来到我国驻智利使馆的大厅，先分别与使馆人员、商务人员以及我们南极考察队员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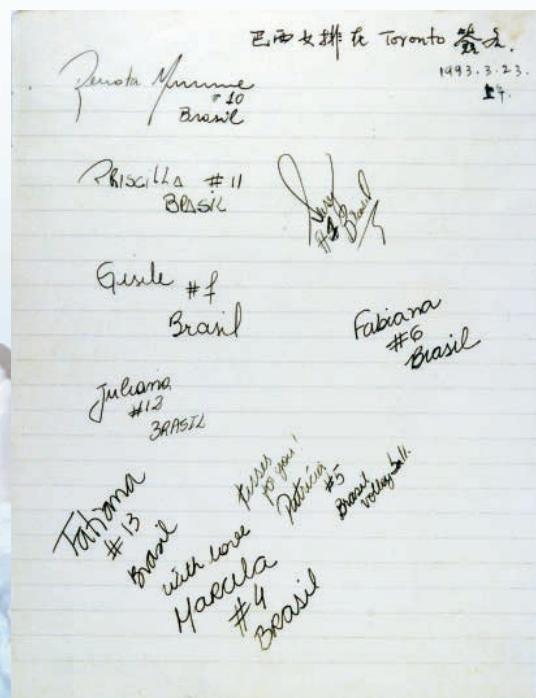
来南美五国访问，智利是他的最后一站，一共只停留 22 个小时。这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日，晚上八点四十分，他来到我国驻智利使馆的大厅，先分别与使馆人员、商务人员以及我们南极考察队员合影留念，然后到里面与大使谈工作。所有这些活动，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然后他的车队就由智利警卫的两辆摩托车开道，离开使馆去参加宴会。这使我亲眼目睹了钱外长的异常繁忙的工作日程。

在圣地亚哥看植物标本 还在二月下旬，我就听说我们可能在圣地亚哥多停留几天，我想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一定要到那里去看南半球的现代植物标本。可是在智利的哪个机构能看到现代植物标本，我却一无所知。那时我想起了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棚井敏雅教授，他曾到过智利，研究过南半球非常重要的属——假山毛榉属，并著有专著。这位德高望重的古植物学家和我素有书信往来，于是我马上写信向他求助，得到了他积极的回应。我一到圣地亚哥，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多亏了他的指点以及他给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标本馆馆长的信，我才得以顺利地在那里看标本。在圣地亚哥期间，我几乎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这个标本馆了。感谢棚井敏雅教授及时的帮助，这次看标本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非常之大，以至于即便是失却了诸如到瓦尔帕莱索——太平洋东岸智利最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去玩的机会，我也丝毫不后悔，因为它们对我的重要

性，根本无法与看标本相比。

当了一回追星族 在这次漫长的回国的旅途中，我还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了一回“追星族”。那是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飞机上，我见到我后面有十来位身材特别修长的女孩，当听说她们是巴西女排队员时，我找出了我随身携带的日记本，走到一个女孩面前，请她签名。她礼貌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让其他队员也签上名字。每个签名旁还注上她们球衣上面的号码，有一位还加上“With love”，另一位写了“Kisses for you”，我真高兴。这些可爱的女孩，身为明星，却是那么地热情、谦虚，那么地阳光！一点都没有“架子”。她们的宝贵签名我一直珍藏着。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们平安地回到阔别半年之久的祖国，抵达首都北京。行程结束了，可这次南极之旅，却永远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全文完）



她礼貌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让其他队员也签上名字。每个签名旁还注上她们球衣上面的号码，有一位还加上“With love”，另一位写了“Kisses for you”。